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4.02.008

风险流动务工是否增加了农户生计韧性

——基于西南地区832份易地搬迁移民数据

赵元科^{1,2}, 施国庆^{1,2}, 杨涛³

(1.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1100; 2. 中国移民研究中心, 南京 211100; 3.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移民局, 郑州 450000)

摘要: 本文利用西南地区832户移民农户调研数据, 运用OLS回归、有序Logit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风险流动务工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正向显著促进了移民的生计韧性发展; 从长远角度来看, 短期流动务工与稳定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明显的促进效果; 异质性分析发现, 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对新生代与老一辈移民生计韧性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对于分散安置的移民群体产生了负向作用。基于此, 提出应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与内生动力, 合理引导移民劳动力务工流动, 并从源头上增强不同安置方式、安置时间、安置地点的移民幸福感与满足感等建议, 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引导。

关键词: 搬迁移民; 流动务工; 风险流动; 生计韧性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24)02-0083-10

一、问题的提出

移民作为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迁移及其社会经济恢复重建活动,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1]。近年来, 中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十三五”时期, 我国用短短五年时间, 成功使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 其中城镇安置500多万人, 农村安置约460万人, 有力推动了搬迁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新型城镇化进程^[2]。易地搬迁工作的完成解决了移民生计的基本需求问题, 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韧性作为一种隐性要素嵌入生计系统中, 旨在阐释农户生计转型中所释放的适应能力、抗击打能力以及在风险冲击中快速恢复的能力^[3]。提高生计韧性不仅有利于防范移民返贫风险, 更有助于实质性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从现实意义上讲, 提高移民生计韧性, 实现共同富裕是易地搬迁留给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忽略的重大问题^[4]。然而, 在此过程中, 社会关系和行为规律的改变以及限制对移民群体的迁移和流动可能会产生不确定性影响^[5], 容易引发大规模重新安置的问题, 并带来各种程度

收稿日期: 2023-09-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跨县搬迁社区治理与后期扶持研究”(21&ZD183)

作者简介: 赵元科(1998-), 男, 山东潍坊人,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移民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移民科学与管理; 施国庆(1959-), 男, 安徽滁州人,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为移民科学与管理; 杨涛(1973-), 男, 河南郑州人,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移民局教授级高工, 研究方向为移民经济与管理。

的生计风险。同时,移民农户生计脆弱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仍然面临着引发相对贫困的各种新风险冲击,“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成为后续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乡土社会所固有的农村经济结构,使得移民农户搬迁到新安置地后,往往处于一种流动务工的状态,面临着不同的务工风险。这种风险流动的务工方式对个人及家庭成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生计韧性感知^[6]。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7]。那么,搬迁安置后的多种流动务工选择所带来的风险对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怎样不同影响呢?有学者认为,移民搬迁安置后农村劳动力为寻求更舒适的生活以提高生计期望而选择外出务工,从而逐渐流动到城市周边务工甚至进入城市以维持生计与发展^[8]。还有学者认为,虽然非农就业扩大了移民的生计感知,优化了生计空间,但搬迁安置后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遗留问题使得部分移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从而倾向选择返乡务工^[9]。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结论进一步归纳整理,学者们针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主观幸福感、减贫、落户以及就业教育^[10-12]等效应方面,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外出务工层面,鲜有探讨多种流动务工的方式选择对于农户生计韧性发展带来的影响。其次,农村劳动力外流及回流问题虽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易地搬迁这一特殊群体安置后所面临的风险流动务工及生计发展状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结合调研组2021-2022年在西南地区部分省份开展的易地搬迁移民调研数据,从微观视角出发,重点讨论不同务工所产生的风险流动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影响。从社会韧性、经济韧性、环境韧性、家庭韧性和心理韧性5个维度构建了移民生计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利用有序响应模型等方法进行了检验及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政策建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引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近年来,生计韧性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性议题,广泛运用于各种社会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背景中。在当今政治、文化和经济多元的时代,生计韧性被视为一种动态过程,受到个体内在认知以及外部环境系统中关键因素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的影响^[13]。其反映了一个家庭或社区从外部冲击、干扰和变化中更新和恢复其生计的能力。Speranza等(2014)认为生计韧性包括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以及学习能力三个维度^[14],具体指在外部压力和冲击下,不同生计群体利用已有生计资本能动性发挥缓冲、学习和自组织等能力应对和适应不确定性,以实现可持续生计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能力层面来看,生计韧性被认为个人或集体适应压力和变化,并利用生计资本组合、配置,保持自身正常功能状态、恢复收入并实现可持续生计发展的内在能力^[15]。生计韧性往往与可持续生计发展理论相结合,其主要内涵包括了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户人均收入、实现资源合理利用、降低贫困程度以及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生计群体利用各种生计资产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来应对外部遭受的冲击,以制定优化生计策略,提升个人、家庭或社区的生计韧性,实现更高水平的生计发展^[16]。

农村劳动力流动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城镇化产生的“拉力”和农业技术进步产生的“推力”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17]。移民人口的迁移流动往往伴随着土地等资源的减少,导致移民生计的多样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这对个人能力以及工作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重新安置也可能导致移民及其所在社区出现短期的相对贫困问题^[18]。移民搬迁安置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社会问题,使得其在流动务工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影响生计韧性的感知和发展。

总体来说,目前搬迁移民流动务工的方式选择可以概括为三种:返迁流动务工、就近流动务工以及外出流动务工。返迁流动务工指移民搬迁安置后,返回原迁出地继续从事原务工或者新的务工活动;就近流动务工指在新安置地就近流动从事农业或二三产业务工活动;外出流动务工指跨省(市/县)在外流动从事农业

或二三产业务工活动。有研究表明,情感可以激发后续的认知行为,影响人们的态度及对结果的感知和判断,并引导其进行决策和行动^[19]。搬迁移民因个人思想、情感、能力等不同,对于风险流动务工的情感与方式选择也不尽相同。从务工内容来看,其原因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土地流转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善搬迁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加之农业经营性收入在农户收入比重中不断下降,同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使得移民逐渐选择非农就业,实现外出流动务工^[15]。另一方面,非农务工自身也存在着诸多不稳定性因素,如非农技能培训的接受与转化程度、适应程度^[20]等,也制约着移民进入二三产业,从而倾向选择返迁流动务农。然而,移民原迁出地往往处于地理环境恶劣、生活质量低下的偏远地区,生计资本的低效性削弱了移民搬迁安置后的生计韧性。“反哺式流动”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移民务工就业问题,但所面临的长期务工时间成本、流动交通成本和信息资本停滞等问题也随之显现^[21],结果导致了移民工作形式的单一与重新安置后对于社会劳动情感的懈怠,造成部分返迁流动移民生计韧性的下降。除此之外,搬迁安置后的区位条件与环境推拉作用也使得部分移民流向城市,进行外出流动务工,与返迁流动务工相比,这类移民更倾向于参与到更高收入与更多务工机会的风险流动过程中。但这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移民农户的生计收入,增加了其经济韧性^[7]。因此,从后脱贫时代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返迁流动务工会逐渐降低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能够增加移民农户的生计韧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正向促进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

移民风险流动务工具有不同的稳定性与周期性。受到外界压力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移民个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生计韧性。稳定就业务工有利于促进农户与当地的社会融合^[22],以增强其对当地的归属感和生活满意度,增加社会保障以提高社会韧性。事实证明,非稳定务工虽然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不会提高农户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加剧了农户群体内部间竞争,同时其所拥有的社会保障水平更低,失业流动率更高^[23]。从务工流动周期性来看,长期务工流动会一定程度增加农户对生计韧性的懈怠感知,降低家庭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11]。短期务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兼顾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家庭生计照料,降低了生计风险,有利于家庭韧性及环境韧性的感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短期流动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稳定流动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调研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8月在贵州、云南两省针对易地搬迁移民开展的实地调研数据。贵州省和云南省是我国易地搬迁大省,“十三五”期间分别搬迁约188万和99.6万人次,是全国第一、第三大易地搬迁省份,贵州、云南两省通过易地搬迁帮助山区等贫困群众离开了穷山僻壤,告别了绝对贫困,实现了搬迁安置后综合就业率超90%以上的新局面,因此,本文研究区域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调查遵循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原则,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对迁入地与迁出地安置区移民农户进行问卷发放与填写,每个地区随机抽取2~3个县(镇),每个县(镇)再根据安置方式分层抽取3~5个安置点,每个安置点随机抽取30~50户,每户调查1人,共计发放问卷900份,总共得到有效样本数据832份。

(二)样本特征

从表1可以看出,移民在流动务工的选择方式中,就近流动务工的人数最多(379人),占比45.6%,选择返迁流动务工的人数最少(179人),占比21.5%。在个体特征层面,40~55岁的受访移民农户人数最多(391

人),占比47%;移民文化程度大多处于初中及高中(含中专)程度,共639人,占比76.8%。从家庭特征层面来看,家庭人口数为4~6人的占总数44.7%;家庭平均年收入大多处于10万元以下,占比71.9%。

表 1 样本移民农户基本特征

指标名称	类别	频次	比例(%)	指标名称	类别	频次	比例(%)
流动务工方式	返迁流动务工	179	21.5	家庭人口数量	1~2	147	17.7
	就近流动务工	379	45.6		2~4	111	13.3
	外出流动务工	274	32.9		4~6	371	44.6
年龄	30~40岁	132	15.9		6人以上	203	24.4
	40~55岁	391	47.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93	11.2
	55岁以上	309	37.1		初中	402	48.3
居住地	集中安置	761	91.5		高中(含中专)	237	28.5
	分散安置	71	8.5		大专及以上学历	100	12.0
婚姻	已婚	611	73.5	家庭年收入	10万元以下	598	71.9
	其他	221	26.5		10万元以上	234	28.1

(三)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农户生计韧性。生计韧性是基于脆弱性与恢复力、生计可持续性、社会风险理论等综合评价的视角,生计主体基于生计资本和能力条件对其所面临生计风险进行应对或抵御,是生计“风险-抵御”耦合和协同作用的结果^[24]。生计韧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层面,还体现在应对各种风险与感知层面。因此,本文在上述对研究学者的文献梳理与生计韧性定义理解基础上,从社会韧性、环境韧性、经济韧性、家庭韧性和心理韧性5个维度构建了农户生计韧性的衡量指标体系,其中社会韧性包括社会地位和信息资源两个指标;环境韧性包括生态环境与生产环境两个指标;经济韧性包括家庭年净收益与恩格尔系数两个指标;家庭韧性包括儿童入学和老人就医两个指标;心理韧性包括风险承受和健康状况两个指标。在构建指标体系后运用等权重法,对每个韧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权重设置为1,计算其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其取值范围为0~10。各指标的设定及其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表2 农户生计韧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社会韧性	社会地位	农户自评社会地位与人脉关系,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0.606	0.219
	信息资源	农户自评接收政策信息与资源状况,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0.601	0.218
环境韧性	生态环境	农户自评安置地生态环境状况,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0.789	0.407
	生产环境	农户自评安置地生产道路状况,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0.653	0.184
经济韧性	家庭年净收益	家庭年净收益高于全样本中位数的40%时,取值为1,否则为0	0.601	0.218
	恩格尔系数	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比小于50%时,取值为1,否则为0	0.705	0.387
家庭韧性	儿童入学	家庭中适龄儿童(6-15岁)均处于上学状态,取值为1,否则为0	0.971	0.254
	老人就医	家庭中老年人(60岁以上)均参加医疗保险时,取值为1,否则为0	0.713	0.167
心理韧性	风险承受	农户自评风险来临时应对解决状况,评分不低于3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0.658	0.334
	健康状况	农户自评自身健康状况,不健康时取值为1,否则为0	0.351	0.186

注:在选取经济韧性指标时,选取恩格尔系数以及高于全样本中位数40%的家庭年净收益指标来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1)风险流动务工。根据问卷中关于移民流动务工的内容变量,1=返迁流动(农业或其他二三产业)务工,2=新安置地就近(农业或其他二三产业)务工),3=跨省(市/县)外出流动农业或其他二三产业)务工。根据移民流动务工范围生成两个解释变量:返迁流动务工和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检验风险流动务工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移民农户返迁流动从事务工时取值为0;就近与外出流动从事务工时取值为1。(2)流动周期性。当移民安置后,务工流动年频率低于或等于2次时,取值为1;务工流动年频率高于2次时,取值为0。(3)流动稳定性。移民流动务工时签订劳动合同或购买医疗、失业等保险,取值为1;未签订劳动合同和未购买医疗、失业等保险,取值为0。

控制变量:包括移民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两类变量。个体特征包含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以及身体状况。家庭特征控制了家庭文化程度、房屋总面积以及家庭劳动力人数。居住地特征控制了居住地安全程度。各变量的选取及具体说明见表3。

表3 变量选取与计算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生计韧性	通过本文构建的生计韧性测度指标计算而来	
核心解释变量	风险流动务工	返迁流动务工	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从事务工时取值为1;返迁流动从事务工时取值为0
		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	
	流动周期性	长期流动	务工流动年频率高于2次,视为长期流动,取值为0;低于或等于2次视为短期流动,取值为1
		短期流动	
	流动稳定性	非稳定流动	务工流动时未签订劳动合同或购买医疗、失业等保险时,视为非稳定流动,取值为0;否则为稳定流动,取值为1
		稳定流动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女=0;男=1
		年龄	受访移民实际年龄
		年龄的平方	受访移民实际年龄平方项
		婚姻状况	未婚=0;已婚=1
		文化程度	小学及未上过学=1;初中=2;高中(含中专)及以上=3
		身体状况	受访移民身体有无重大疾病状况,无=1;有=0
	家庭特征	家庭文化程度	移民家庭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成人:小学及未上过学=1;初中=2;高中及以上=3
		房屋总面积	家庭居住房屋实际面积(hm ²)
		家庭劳动力人数	家庭实际从事劳动力人数
	居住地特征	居住地安全程度	认为居住地安全=1;一般=2;不安全=3

(四)研究方法

1. OLS模型。本文采用OLS最小二乘法来进行实证分析,构建农户生计韧性指标体系,赋值从1-10为连续取值。模型设定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text{Migration} + \beta_2 \text{Control}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Y_i 表示第*i*个移民农户的生计韧性;Migration表示移民风险流动务工的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居住地特征等; β 为待估计系数; ε 为不可观测的误差项。

2. 有序响应模型(Ologit)。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变量,因此可以通过运用Ologit模型来检验风险流动务工对生计韧性的影响,以改变估计方法来对实证结果进一步分析。本文被解释变量为移民农户生计韧性,

共划分为10个等级,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Y_1 = \alpha + \alpha_1 Bmigration + \alpha_2 Control + \mu \quad (2)$$

$$Y_2 = \alpha' + \alpha_1' NOmigration + \alpha_2' Control + \mu' \quad (3)$$

其中, Y_1 和 Y_2 表示移民生计韧性程度, $Bmigration$ 和 $NOmigration$ 分别表示返迁流动务工和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 α 和 α' 为常数项, α_1 、 α_1' 、 α_2 、 α_2' 分别为以上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μ 和 μ' 为服从逻辑分布的随机干扰项。那么其被解释变量的选择规则为:

$$Y = \begin{cases} 0, & \text{若 } Y \leq r_0 \\ 1, & \text{若 } r_0 \leq Y \leq r_1 \\ 2, & \text{若 } r_1 \leq Y \leq r_2 \\ \dots \\ 10, & \text{若 } r_9 \leq Y \leq r_{10} \end{cases} \quad (4)$$

其中, Y 为可观测到的移民农户生计韧性, r_0 、 r_1 ... r_{10} 为切点,由模型估计而得。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运用OLS模型检验风险流动务工对移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远小于10,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很小。表4汇报了不同风险流动务工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第(1)列解释变量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风险流动务工对生计韧性的影响,Pseudo R^2 为0.017;第(2)~(4)列分别加入了个体、家庭与居住地特征的控制变量,Pseudo R^2 上升到0.022、0.025、0.050,表明模型的解释力进一步增强。从影响系数来看,分别加入控制变量后,风险流动务工的影响系数变小但是仍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与返迁流动务工相比,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的移民对于生计韧性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当前易地搬迁移民实际情况一致,由此H1得到了证实。

表4 风险流动务工与农户生计韧性

变量	生计韧性			
	(1)	(2)	(3)	(4)
风险流动务工	0.268*** (0.021)	0.260*** (0.019)	0.257*** (0.018)	0.259*** (0.018)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居住地特征				控制
常数项	2.762*** (0.025)	2.260*** (0.057)	2.213*** (0.034)	1.783*** (0.049)
Pseudo R^2	0.017	0.022	0.025	0.050
样本量	832	832	832	832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考虑到务工流动具有主观层面认知,务工成本、收入、人脉以及家庭成员状态存在很大的差异,移民有流动务工时间和频率上的个体选择性。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流动周期性与流动稳定性对移民农户生计

韧性的影响。表5汇报了风险流动务工周期对移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第(1)列为解释变量流动周期性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效应,第(2)~(4)列为在基础回归上分别加入了个体、家庭以及居住地特征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分别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流动周期性的系数变小但依旧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流动周期性的缩短对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讲,短期流动务工会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产生更显著的影响作用。究其原因,移民自身对于流动务工所产生的风险具有明确的认知,长期流动从短时间来看也许会增加移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生计韧性,但从长远角度考虑可能会影响其家庭生活照料,包括孩子入学及老人医疗康养等感知,同时长期处于务工流动,会增加移民对工作的消极怠慢,降低对收入的期望。与长期流动相比,短期流动更有利于移民进行家庭生活的稳定照料,提高社会的融入,表现出更有利于移民生计韧性发展的趋势,H2得以验证。

表5 流动周期性与农户生计韧性

变量	生计韧性			
	(1)	(2)	(3)	(4)
流动周期性	0.176*** (0.014)	0.153*** (0.011)	0.149*** (0.011)	0.145*** (0.010)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居住地特征				控制
常数项	2.761*** (0.025)	0.036** (0.056)	2.413*** (0.036)	0.140** (0.058)
Pseudo R ²	0.007	0.013	0.016	0.033
样本量	832	832	832	832

同样,表6汇报了风险流动务工稳定性对移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第(1)列为解释变量流动稳定性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影响效应,第(2)~(4)列为在基础回归上分别加入了个体、家庭和居住地特征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稳定流动对移民生计韧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从促进效应来看,可以认为,即使处于务工流动状态,移民也倾向于选择具有一定保障性的工作形式,对于实现家庭照料、提高生计幸福感以及归属感也具有认知作用,表明移民流动务工越稳定,表征的生计韧性也会越强,H3得以验证。

表6 流动稳定性与农户生计韧性

变量	生计韧性			
	(1)	(2)	(3)	(4)
流动稳定性	0.266*** (0.021)	0.240*** (0.019)	0.240*** (0.019)	0.241*** (0.019)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居住地特征				控制
常数项	2.761*** (0.025)	0.036* (0.056)	2.413*** (0.036)	0.140** (0.058)
Pseudo R ²	0.007	0.013	0.016	0.031
样本量	832	832	832	832

(二)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模型调整和缩小样本的方式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处理一个取值离散的有序变量时,除OLS模型外,还可以使用有序响应模型(Ologit)来检验估计风险流动务工对移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移民安置后户籍身份的转换提升了农村移民主观福利状况^[25]。考虑到安置后户籍门槛的短期冲击效应。本文进一步删除了暂时户籍不在此地(因新安置地搬迁落户程序审批周期等原因)的样本农户,表7汇报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基于各种检验方法均显示,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对移民农户的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调整		缩小样本	
	(1)	(2)	(1)	(2)
风险流动务工	0.193*** (0.056)	0.027*** (0.009)	0.191*** (0.047)	0.013* (0.007)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²	0.048		0.044	
样本量	832		801	

注:第(1)列为系数估计结果,第(2)列为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通过上述回归,结果虽然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仅仅是平均水平上的估计结果,没有考虑到移民之间存在的代际差异。移民在搬迁安置前后,受年龄、生活方式等特征影响在群体之间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与生活差异,新生代(出生在1980年及以后年份)与老一辈(出生在1980年之前)移民群体对风险流动务工的态度与生活期望可能存在不同差异。集中安置(集体搬迁到某一集中居民点生活)与分散安置(分散搬迁到各个不同居民点生活)也可能会影响到移民升级发展状态,从而改变移民风险流动务工的选择,影响其生计韧性。基于该考虑,本文又进一步分析了移民风险流动务工对生计韧性影响的代际与安置方式差异。表8汇报了对比分析结果。从代际差异来看,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对于新生代和老一辈移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别在1%和5%统计水平上显著。从搬迁安置方式来看,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对集中安置的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分散安置的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体现了在当今大杂居、小聚居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往往处于比较集中搬迁社区生活的移民,对于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表现出的生计韧性越强烈,相反,分散安置的移民往往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其生计韧性也随着返迁流动务工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

表8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新生代移民	老一辈移民	集中安置	分散安置
风险流动务工	0.189*** (0.023)	0.075** (0.031)	0.164*** (0.023)	-0.182*** (-0.0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²	0.014	0.004	0.008	0.014
样本量	362	470	761	71

五、结论与建议

移民在搬迁安置后的生计重构过程中容易引发生计断裂,生计韧性有利于移民个体和家庭应对社会风险冲击,学习当前生计模式以适应新的生计变化和挑战,对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乡村振兴意义深远。基于西南地区832户易地搬迁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及有序Logit模型分析风险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移民随着搬迁安置表现出不同风险流动务工对生计韧性的感知状态,就近流动务工以及外出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性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也与现有研究结论类似^[10],外出流动务工与就近流动务工能够实现家庭生活的日常照料,提升主观幸福感。而返迁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性并未表现出正向影响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原迁地生计环境的恶劣、生计方式的单一以及生计资本的短缺。部分移民土地深厚的情节以及农业生产的“惯习”使得前往原迁地从事原务工活动,但低效的农业生产环境、非农务工的选择与适配数量都制约着移民收入进一步提升,一定程度上不利用未来生计发展的持续^[26]。进一步研究发现,处于短期流动务工与稳定性流动务工有利于移民生计韧性的提高与发展。由于移民处于长期务工流动状态,会使之面临务工成本过高、务工就业心理懈怠以及风险的加剧,虽能一定程度促进收入增长,但流动频率相对较低的务工方式仍是更优的生计选择。同时,非稳定性务工流动的工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持续性^[11],且带给移民更为不确定的风险感知,因此,移民往往会选择短期流动与稳定流动务工以增加对自身家庭及生活的照料,增加社会融入与生计幸福感。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表明,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对新生代与老一辈移民生计韧性的发展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分散安置的移民群体产生了负向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一论述为我国易地搬迁移民群众生计发展指明了方向。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在政府出台给予搬迁移民各项帮扶措施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放在移民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提升,将移民视为具有能动性自主性的生计发展主体,因地制宜回应不同移民的生计发展诉求及生活愿景。改善移民返迁流动务工意愿,并结合移民生计韧性发展需求,对接当地就业以及培训务工资源,为移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务工劳动参与选择,以提升不同流动务工群体的生计韧性。其次,合理引导移民劳动力务工流动,加快形成移民县域产业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移民安置地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各类后续扶持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服务制度体系,实施新一轮高效农业机械化及相关就业务工培训,以帮助实现移民稳定且主观幸福的务工流动。最后,推进移民乡村美丽家园、乡风文明建设,结合不同移民安置区实际情况改善人居环境,从源头上增强不同安置方式、安置时间、安置地点移民的幸福感与满足感,以增强脆弱性移民对生计风险的抵御能力,提升生计韧性。

需要指出的是,移民风险流动务工策略的选择受个人、家庭及周边社区环境的共同影响,同时生计韧性也受搬迁安置方式、地点、时间等因素共同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从移民农户主体行为与感知层面厘清移民风险流动务工影响生计发展的原因与内在机制仍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朱东恺,施国庆.水利水电移民制度研究:问题分析、制度透视与创新构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8.
- [2]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伟大成就与实践经验[EB/OL].[2021-06-30].国家乡村振兴局,http://www.nrra.gov.cn/art/2021/7/9/art_28_190782.html.
- [3] 李小云,林晓莉,徐进.小农的韧性:个体、社会与国家交织的建构性特征——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疫情下的生计[J].农业经济问题,2022(1):52-64.

- [4] 杨文静,孙迎联.我国反贫困治理与农户生计转型:历史回顾与改革前瞻[J].经济学家,2022(5):97-106.
- [5] DE HAAS, H. A Theory of Migration:the Aspirations-capabilities Framework[J].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2021,9(1). doi:10.1186/s40878-020-00210-4.
- [6] LI E, DENG Q, ZHOU Y.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s out of Pover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Lankao County, Henan Province,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93):210-222.
- [7] 尹志超,刘泰星,张诚.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4-42.
- [8] 王艳,彭婧,党晶晶.移民的迁移意愿与生活期望——基于宁夏生态移民调查数据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J].西北人口,2017,38(4):116-121.
- [9] 付少平,赵晓峰.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6):8-16+136.
- [10] 王子凤,张桂文.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J/OL].西北人口:1-14.
- [11] 谭昶,吴海涛,彭燕.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9.
- [12] 谷宏伟,吴华倩.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儿童义务教育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7(3):91-98.
- [13] 林泽宇,杜婵.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能否提高农户生计韧性?——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样本[J].农村经济,2023(8):122-133.
- [14] SPERANZA C I, WIESMANN U, RIST S. An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ecological Dynamic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28):109-119.
- [15] 王亚红,马道萍.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其障碍因素诊断——基于河南省某深度贫困乡镇的实证调查[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4):476-484.
- [16]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Z]. London: DFID, 1999:445.
- [17] 李斌,吴书胜,朱业.农业技术进步、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于“推拉理论”和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15(10):3-10.
- [18] CERNEA, M. The Risks and Reconstruction Model for Resettling Displaced Populations[J]. World Dev, 1997(25):1569-1587.
- [19] 程军,刘玉珍.农民的土地情感及其代际差异——基于土地流转的分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4):41-48.
- [20] 申鹏,曾杰.易地搬迁移民新技能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民族地区为例[J].新疆农垦经济,2019(11):26-35.
- [21] 吕建兴,曾小溪,汪三贵.扶持政策、社会融入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返乡意愿——基于5省10县530户易地扶贫搬迁的证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3):29-40+156.
- [22] 孙学涛,张丽娟,张广胜.农民工就业稳定与社会融合: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假设的比较[J].农业技术经济,2018(11):44-55.
- [23] 石智雷,刘思辰,赵颖.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J].社会,2022,42(1):88-123.
- [24] 常洁,谢萍,别小娟.旅游驱动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变化及提升对策研究——兼顾不同社区参与模式的比较[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22,39(4):27-39.
- [25] 温兴祥,郑凯.户籍身份转换如何影响农村移民的主观福利——基于CLD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9,45(5):58-71.
- [26] 齐放芳,谢大伟,苏颖.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返乡意愿分析——基于新疆南疆深度贫困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新疆社会科学,2021(2):133-138+152.

(责任编辑:颜 莉)